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总主编：金 碚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

THE FRONTIER RESEARCH REPORT ON
DISCIPLINE OF
REGIONAL ECONOMICS

孙久文 胡安俊 主编

区域经济学学科 前沿研究报告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总主编：金 碚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系列丛书

THE FRONTIER RESEARCH REPORT ON
DISCIPLINE OF
REGIONAL ECONOMICS

孙久文 胡安俊 主编

区域经济学学科 前沿研究报告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域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2012 ~ 2014/孙久文, 胡安俊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 - 7 - 5096 - 5022 - 6

I. ①区… II. ①孙… ②胡… III. ①区域经济学—研究报告—世界—2013 IV. ①F0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4127 号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张永美 赵亚荣

责任印制: 司东翔

责任校对: 雨 千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16

印 张: 23

字 数: 51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5022 - 6

定 价: 7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专家委员会

主任：李京文

副主任：金 碚 黄群慧 黄速建 吕本富

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开泰	毛程连	王方华	王立彦	王重鸣	王 健	王浦劬	包 政
史 丹	左美云	石 勘	刘 怡	刘戒骄	刘 勇	刘伟强	刘秉链
刘金全	刘曼红	刘湘丽	吕 政	吕 铁	吕本富	孙玉栋	孙建敏
朱 玲	朱立言	何 瑛	宋 常	张 晓	张文杰	张世贤	张占斌
张玉利	张屹山	张晓山	张康之	李 平	李 周	李 晓	李子奈
李小北	李仁君	李兆前	李京文	李国平	李春瑜	李海峥	李海舰
李维安	李 群	杜莹芬	杨 杜	杨开忠	杨世伟	杨冠琼	杨春河
杨瑞龙	汪 平	汪同三	沈志渔	沈满洪	肖慈方	芮明杰	辛 暖
陈 耀	陈传明	陈国权	陈国清	陈 宪	周小虎	周文斌	周治忍
周晓明	林国强	罗仲伟	郑海航	金 碚	洪银兴	胡乃武	荆林波
贺 强	赵顺龙	赵景华	赵曙明	项保华	夏杰长	席酉民	徐二明
徐向艺	徐宏玲	徐晋涛	涂 平	秦荣生	袁 卫	郭国庆	高 闯
符国群	黄泰岩	黄速建	黄群慧	曾湘泉	程 伟	董纪昌	董克用
韩文科	赖德胜	雷 达	廖元和	蔡 昉	潘家华	薛 澜	魏一明
魏后凯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

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金 碚

副总主编：徐二明 高 闯 赵景华

编辑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相昱	于亢亢	王 钦	王伟光	王京安	王国成	王默凡	史 丹
史小红	叶明确	刘 飞	刘文革	刘戒骄	刘兴国	刘建丽	刘 颖
孙久文	孙若梅	朱 彤	朱 晶	许月明	何 瑛	吴冬梅	宋 华
张世贤	张永军	张延群	李 枫	李小北	李俊峰	李禹桥	杨世伟
杨志勇	杨明辉	杨冠琼	杨春河	杨德林	沈志渔	肖 霞	陈宋生
陈 宪	周小虎	周应恒	周晓明	罗少东	金 准	贺 俊	赵占波
赵顺龙	赵景华	钟甫宁	唐 镛	徐二明	殷 凤	高 闯	康 鹏
操建华							

序 言

为了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施，加快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定位要求，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旨在准确把握经济和管理学科前沿发展状况，评估各学科发展近况，及时跟踪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积极推进学科建设，特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重点大学的专家学者研究撰写《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本系列报告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支持和肯定，特将本系列报告丛书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经济学包括能源经济学、旅游经济学、服务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合作、世界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包括工商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三个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包括管理学、创新管理、战略管理、技术管理与技术创新、公司治理、会计与审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企业信息管理、物流供应链管理、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等学科及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学科包括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政府绩效管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学、城市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电子政务学、社会保障学、政治学、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等学科及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包括工程管理、电子商务、管理心理与行为、管理系统工程、信息系统与管理、数据科学、智能制造与运营等学科及研究方向。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独特的学术地位和超前的研究优势，撰写出具有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前沿报告，致力于体现以下特点：

(1) 前沿性。本系列报告能体现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最新前沿动态，包括各学术领域内的最新理论观点和方法、热点问题及重大理论创新。

(2) 系统性。本系列报告囊括学科发展的所有范畴和领域。一方面，学科覆盖具有全面性，包括本年度不同学科的科研成果、理论发展、科研队伍的建设，以及某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就各学科而言，还将涉及该学科下的各个二级学科，既包括学科的传统范畴，也包括新兴领域。



(3) 权威性。本系列报告由各个学科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主编和组织本领域内一流的专家、学者进行撰写,无疑将是各学科内的权威学术研究。

(4) 文献性。本系列报告不仅系统总结和评价了每年各个学科的发展历程,还提炼了各学科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及重要学术成果,因此具有工具书式的资料性,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经济管理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全面体现了经济、管理学科及研究方向本年度国内外的发展状况、最新动态、重要理论观点、前沿问题、热点问题等。该系列报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以及一些重要的研究方向,其中经济学科及研究方向15个,管理学科及研究方向45个。该系列丛书按年度撰写出版60部学科前沿报告,成为系统研究的年度连续出版物。这项工作虽然是学术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但意义十分重大。要想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大量的组织、协调、研究工作,更需要专家学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在此,特向参与本研究的院内外专家、学者和参与出版工作的同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相信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会进一步推动中国对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同时,也希望本系列报告的连续出版能提升我国经济和管理学科的研究水平。

金 碚

2014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2012年以来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综述	001
第一节 全球经济的低迷与中国经济新常态	001
第二节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	006
第三节 产业转移与国土开发的空间结构	014
第四节 碳足迹、生态补偿与环境规制	025
第二章 区域经济学学科2012~2014年中英文期刊论文精选	028
第一节 中文期刊论文精选	028
第二节 英文期刊论文精选	301
第三章 区域经济学学科2012~2014年中英文图书精选	313
第一节 中文图书精选	313
第二节 英文图书精选	324
第四章 区域经济学2012~2014年大事记	349
后 记	357

第一章 2012 年以来国内外区域 经济学研究热点综述

2012 年以来,国内和国外的区域经济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热点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热度。我们在本书中将分五个部分对 2012 年以来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介绍:国外区域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期刊文献,国外区域经济学前沿研究的主要著作,国内区域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期刊文献,国内区域经济学前沿研究的主要著作,国内区域经济学大事记。同时,我们特别关注金融危机后经济下滑的研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的研究。

第一章作为导论,在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我们将重点阐述金融危机后经济下滑的研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的研究,产业转移与国土空间结构的研究,碳足迹与环境规制的研究。

第一节 全球经济的低迷与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的普遍性下滑,长期停滞 (Secular Stagnation) 理论逐渐引发广泛关注。长期停滞这一概念始于 Hansen (1939) 的研究,他认为出生率的下降、储蓄倾向的增加等将导致需求的长期不振,大萧条可能开启一个持续失业和增长停滞的新时期。2013 年 Summers 在 IMF 的演讲使得长期停滞理论重新获得关注。虽然此次危机引发的恐慌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大幅宏观政策干预下的经济增长依然迟迟回归不到危机前的趋势。在此背景下,Summers 认为,本轮全球危机可能如 Hansen 分析的那样开启一个以低增长、高失业、低物价与低产能利用率等为表征,难以由传统政策有效刺激的经济长期不景气时期。图 1 所示为 1980 ~ 2014 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与消费者价格年度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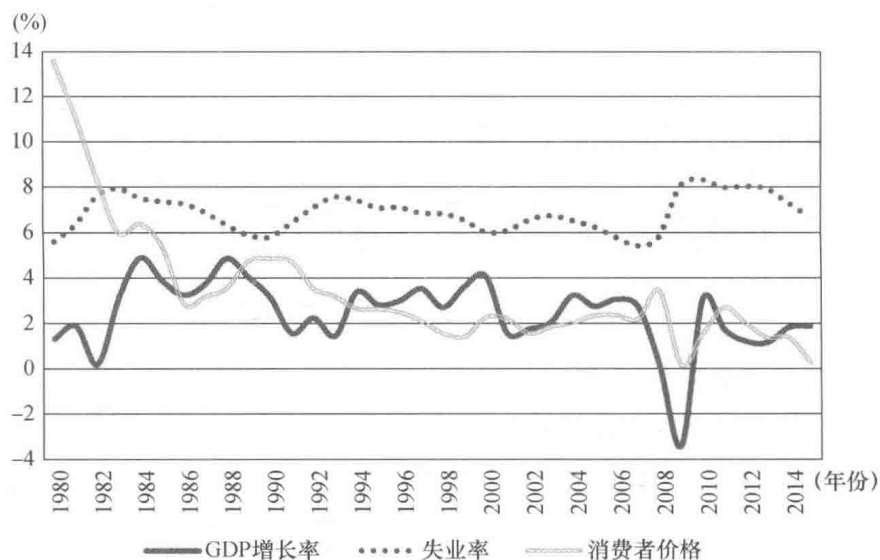


图1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与消费者价格年度变化 (1980 ~ 2014 年)

资料来源：刘元春，杨丹丹，胡安俊．金融延续增长、长期停滞与阶段分化 [J]．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6 (11)．

1. 科技停滞

在丰饶而廉价的土地、大量移民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1880 ~ 1940 年难以计数的科技进步成果等的推动下，发达经济体实现了快速增长。当土地、人口与科技红利消耗殆尽之后，发达经济体科技创新速度减缓，进入科技高原阶段。这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规律有关。人类社会任何的技术，都有一个起点。所谓进步，就是沿着这个起点，通过创新，演绎衍生出更加丰富的体系和框架，不断扩大技术本身的效用。但是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其体系本身的复杂性也会不断提升，新的创新就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最终出现瓶颈，陷入停滞期。更关键的是，科技创新需要资金投入。一条技术道路开辟之后因为很容易看到回报，所以资本愿意投资技术改进。但随着复杂性的增加，投资金额开始变大，回报周期开始变长，回报金额开始递减，最终，资本望而却步，无力推进（泰勒·考恩，2015）。以美国为例，1972 ~ 1996 年、2004 ~ 2014 年 TF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52 和 0.54，科技进步非常缓慢（Gordon，2015）。

近年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物联网革命、大数据时代等名词不断涌现（杰里米·里夫金，2012；斯蒂芬·赫克、马特·罗杰斯和保罗·卡罗尔，2015；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2013），但是互联网、大数据并没有创造足够的 GDP 和就业，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泰勒·考恩，2015）。全球变暖背景下，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前景广阔，但是其中涉及的可再生能源储存、全球能源互联网传输等诸多技术瓶颈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很难在短期内产生适用于普遍产品的科技革命。



2. 利润率的持续下滑

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是利润率的持续下降。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家倾向于采取效率更高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以机器替代劳动。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又通过低盈利能力和信用制度这两个中间环节影响社会总需求与科技进步（安德鲁·克莱曼，2013）。一方面，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平均盈利能力降低，低水平的盈利能力导致资本的积累率下降。低资本积累率又导致就业、产出、收入和对消费品与服务需求的低增长率。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率较低，利率也会较低。低利率使得借款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而导致债券、股票和不动产的价格上升，鼓励了这些资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信用的这种扩张不仅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脆弱性，也会通过把资金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阻碍科技创新的发展。

马克思、约翰·富拉顿（John Fullarton）认为，“资本消灭”（金融和实物资产价值下降或实物资产本身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会扭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面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的衰退，发达经济体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了大量干预。经济的干预使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所消灭的资产价值比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少得多，从而利润率的下降过程没有得到扭转，发达经济体进入长期停滞期。

3. 有效需求不足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了增加利润，设法削减工资、减少正式职工数量、增加临时工和短期的低工资劳动力。但是，无论经济发展多么迂回生产，产品最终要被大众消费购买力所购买，其生产能力最终要受到消费能力的制约。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就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抑制最终购买者的消费能力。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引致有效需求不足（林直道，2005）。

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也会导致意愿储蓄大于意愿投资，进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20世纪中叶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新兴经济体先后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实现了储蓄的加速积累。金融危机后，更加严格的资本和抵押品要求，增加了安全资产的数量。全球增加的不平等也大幅增加了储蓄数量。但是，发达国家缓慢的人口增长、资本品相对价格的持续下降，降低了消费和投资数量（Summers, 2015；泰勒·考恩，2015；托马斯·皮凯蒂，2014）。在零利率下限的制约下，意愿储蓄相对意愿投资出现长期过剩，引起有效需求不足。正如 Hansen（1939）所言，在意愿储蓄长期超过意愿投资的情况下，未来经济体的特征是病恹恹的复苏和自我强化的衰退。

近年来，日本央行、欧洲央行、瑞典央行等先后实施负利率政策，增加流动性，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刺激经济发展。但由于超低或负利率政策有五个主要风险：丧失正确动机、偏离工作重点、扭曲合理机制、破坏商业模式以及幻觉消失。当政策利率降低到几乎为零，以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各国中央银行大规模市场干预使得其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时，人们的共识是：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是暂时的（艾尔维·阿依，2015）。因此，超低

利率或负利率也无法解决意愿储蓄相对意愿投资的长期过剩问题。

4. 结构失衡

沉重的福利经济、臃肿的政府规模、僵化的雇佣体制与企业并购限制、扩大的不平等结构性问题，降低了全球经济的灵活性与活力，从而带来了经济的长期停滞（Summers, 2015；泰勒·考恩, 2015；池田信夫, 2015；托马斯·皮凯蒂, 2014）。欧洲沉重的福利经济，已经严重制约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伴随着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快速需求，政府规模也在快速增加。但是，政府的角色越重要，所公布的 GDP 增长数据同我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越脱节；政府财政支出在经济中所占比例越高，越难确切知道经济实际增长状况和生活水准状态。臃肿的政府规模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泰勒·考恩, 2015）。对于日本经济，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雇佣制度才是经济停滞的最大原因。日本企业间的相互持仓防止并购，使得日本的资本市场变成了一潭死水（池田信夫, 2015）。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的过程也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财富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的扩大制约了需求的增长（托马斯·皮凯蒂, 2014）。

二、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市场疲软、国内需求不足，再加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扬，导致大量企业纷纷倒闭，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等经济指标不断下滑，GDP 增速由 2007 年的 14.2% 下降到 2014 年的 7.4%，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图 2 所示为 2000~2014 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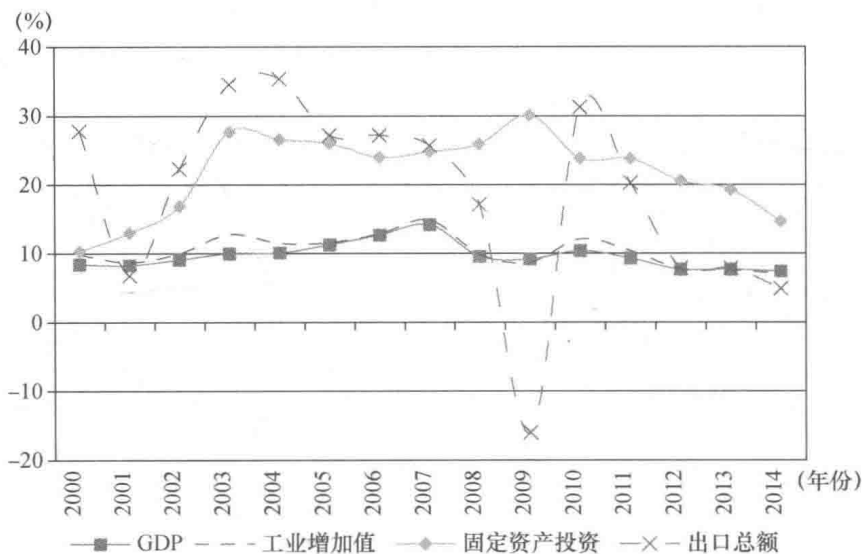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经济增速的演化 (2000~2014 年)

资料来源：胡安俊. 产业生命周期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下滑具有潜在增长能力、经济周期和政策决策三个方面的原因(胡安俊, 2016)。

1. 潜在增长能力下滑

根据 Solow 增长模型,在技术和制度给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曼昆, 2011)。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7595 美元,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内蒙古、辽宁、福建、广东 9 个省(市、区)进入人均 GDP “1 万美元俱乐部”。与较高的人均 GDP 相对应,潜在增长速度呈现下滑态势。尤其是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改革红利衰减、全球化红利耗竭、工业化红利递减、人口红利逆转,这些作用使得中国潜在 GDP 增速不断回落(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15)。

2. 经济周期波动

中国是一个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国家,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需求疲软,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2014 年中国出口增速跌到 4.9%。与此同时,在房地产周期调整、“去杠杆”和“去产能”、反腐等作用下,2014 年投资增速下降到 14.7% (刘元春, 2014)。出口和投资的双下降,透过乘数效应引致经济加速下行。

3. 政策后遗症

2008 ~ 2010 年国家实施了大规模救助和非常规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入“信贷—投资驱动模式”,这导致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流动性泛滥、经济泡沫化、产能过剩等问题,经济系统风险难以在短期化解(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15)。

在经济增长潜力下滑、外需增长尚不明朗、强刺激政策亟待消化的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需要通过创新驱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吸收过剩流动性,转换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上述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围绕创新、企业家精神展开了大量研究,以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面临机遇的同时,区域发展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主要有全球经济再平衡、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四大挑战(孙久文, 2015)。

第一,全球经济再平衡倒逼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虽然全球经济在复苏,但主要经济体和地区之间存在重要差异,全球经济增长不均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会明显地放缓。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在力求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发展等挑战。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面临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挑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不畏艰难地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第二，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峰值的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面临拐点。近年来各地“用工荒”已渐成常态，劳动力无限供给、依靠“人口红利”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目前，我国的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占世界老龄人口总数的1/5，而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增速在人口大国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象。人口老龄化既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也是区域发展中地方财政的一个巨大负担。

第三，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在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

第四，城乡二元结构矛盾逐渐凸显。在城镇化过程中，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被破除，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在某些地区却在强化，成了突出的二元结构矛盾，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各大、中城市中，外来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本地户籍的农业人口，外来人口不断增多，这是由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消除城市二元结构，就是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紧紧围绕解决好现有“三个一亿人”问题，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和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和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等，推动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和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第二节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

一、“一带一路”的提出与发展

2013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1. 合作方向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重点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方面加强合作。

(1) “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



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

(2) “一带一路”设施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

(3) “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这块大“蛋糕”。

(4) “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5)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2. 合作特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沿线国家的国际区域合作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化趋势。其主要特征是（孙久文和顾梦琛，2015）：

(1) 国际贸易的区域化特征凸显。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贸易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的国际区域合作多基于地缘优势，主张在地理分布、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基础上，构建规模大、层次高、机制化的多边区域合作关系。近年来，随着WTO区域贸易协定等多边机制步履维艰，基于双边、简单多边的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加速，成为国际区域合作的新模式。区域性贸易协定范围小、交易成本低，使各国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升，其以更为灵活、多样的形式，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2) 国际分工进入价值链分工时代。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向世界范围延伸和布局，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以往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依附于发达国家，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一带一路”沿线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较弱，对外贸易产品主要是能源类产品、初级产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投资合作互补性较强，这为中国延伸价值链提供了新机遇。

(3) 合作的空间结构：从圈层辐射开放模式向轴带合作模式演进。以往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合作中，空间结构上以圈层辐射的开放模式占据主导。而在轴带合作模式中，铁



路、公路、水路等交通主轴，将充当要素、产品流动交换的通道，交通主轴沿线将形成若干城市群，最终连成经济带合作形式的条带状空间结构。

(4) 沿线的多数地区处于发展洼地，需要通过对外合作提升国内区域发展潜力。“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除了欧洲以发达经济体居多外，大部分国家为亚非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向西开放的背景下，西部和边境地区有机会充当国内外开展往来的中介。随着跨境经贸往来的增加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这些地区将逐渐聚集产业、人口、资金和技术，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3.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区域合作重点方向

(1) 主导跨国产业链分工。“产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崛起的重要支撑点。作为中国，须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跨国产业链，占据高价值链环节。提升产业层次是主要任务。

(2) 推进沿线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群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才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城市系统的发展和升级与产业发展与分工深化的过程紧密联系。随着产业分工系统的扩张，中心地演化为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再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城市区域或城市群方向发展，最终贸易与分工腹地会延伸至更广泛区域以及国际范围。从长远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依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

(3) 创新国际区域合作模式。一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合作有三种模式：松散型合作、制度型合作、功能型合作。松散型合作难以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落实；制度型合作较为不便且难以在庞大的国家数量和覆盖范围内建立，所以，以发展产业和科技等非政治议题的且涵盖大量小的制度建设的功能型合作可以首先展开。对于功能型合作的模式，“一带一路”是一个宏大的蓝图，在多边机制进展缓慢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的、中微观层面上的多样化、灵活性的区域性合作将有效地将战略落实。

构建跨境次区域合作模式，不失为在初始阶段和中长期都较为合适的方案。跨境次区域合作，通常由边境地区的两国或多国政府、企业共同推动。相比跨国区域合作，此研究视角更中观和微观，关注重点在于边境区位影响核心城市区位而非核心国家辐射边缘国家，参与的主体除了国家外，还包括边境省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上不一定规定统一制度，更具灵活性。

(4) 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所提出的“五通”模式，旨在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国际大通道的建设能有效拉动内陆地区的对外进行。目前，第二欧亚大陆桥已成为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纽带。近年来，由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通往欧洲的渝新欧、蓉欧、汉新欧、郑新欧、西新欧等对欧外贸物流专列陆续开通，为欧亚铁路运输网络再添通道，开创了欧亚互联互通的新机制。第三欧亚大陆桥已处于构想阶段，届时可能将以广东沿海港口群为起点，以昆明为枢纽，经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最终抵达荷兰鹿特丹港。随着这些国际大通道网络的不断完善和运输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将更加稳固。同时，在铁



路的基础上,还应促进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构建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

二、长江经济带的新建设

长江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长江通道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做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

1. 长江经济带的研究与实践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以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作为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一级轴线的战略,国内著名学者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孙尚清、王梦奎、王慧炯、李善同、陈栋生、白和金、林兆木、刘江、魏后凯等给予了充分的认同。他们同时强调了21世纪初中国应该继续实施“T”字型宏观结构战略的重要性。文献如下(陆大道,2014):

(1) 1987年3月25日《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中明确强调:“在生产力总体布局方面,以东部沿海地带和横贯东西的长江沿岸相结合的‘T’型结构为主轴线,以其他交通干线为二级轴线,按照点、线、面逐步扩展的方式展开生产力布局。”1988年以“草案”的形式发到全国试行。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强调:“在‘九五’期间乃至下个世纪,……要建设一个辐射和支撑全国的开发开放架构。这个架构就是以沿海开放地区为横轴,以长江流域为纵轴的‘T’型开发开放战略”,“‘T’字型经济增长格局发展后劲强而有力,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举足轻重,意义重大……”

(3) 2000年,王梦奎和王慧炯强调:“加快长江经济带的综合开发,建成继沿海之后的又一经济发展先行区。……长江经济带将是我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也将是支持21世纪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区域增长轴线。”

(4) 2014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而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与方向。

2.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

(1) 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独特作用,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沿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充分体现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内河经济带。

(2) 长江经济带是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要立足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的比较优势,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引领作用,促进中上游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内生发展活力,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